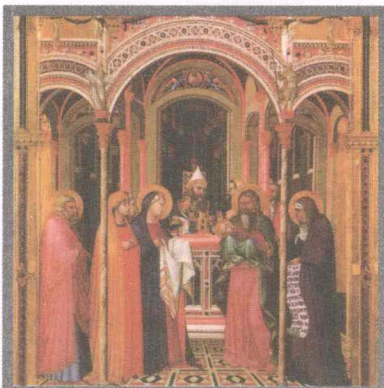


欧洲文艺复兴史

刘明翰 主编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朱孝远 著

欧洲文艺复兴史

政治卷



人民出版社

K503
L652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史

人民出版社

政治卷

刘明翰 主编 朱孝远 著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 / 刘明翰主编 朱孝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01-008467-1

I. ①欧... II. ①刘...②朱... III. ①文艺复兴—历史—欧洲②政治思想史—欧洲—中世纪 IV. ①K503 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578 号

书 名 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

OUZHOU WENYI FUXING SHI ZHENGZHI JUAN

著 译 者 刘明翰主编 朱孝远著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93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8467-1

定 价 39.50 元



导 论

历史学家总是特别关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不管历史如何分类，他们总是一遍遍地反复陈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有两个理由促使他们这么做：他们重视灿烂时期常有的那种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殊力量，相信由衰及盛转变中所蕴藏着的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样，他们也关注灿烂时期的自由、开放精神，因为在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常常是危机与创造并存，通过创建新的体制，人们找到了通向幸福的新途径。

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让欧洲摆脱困境、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时期。如同欧洲历史上其他的重要时期一样，这一过程，也是光亮与暗淡并存。一种从市民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创造力左右大地，自由、平等、民意成了缔造伟大新时代的标志。瑞士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感怀于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文化成就，于1860年发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①的感慨。在布克哈特笔下，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出现了，个人的精神发展了，不仅是古典文化复兴，而且还带来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随着文化的转变，社交、节日庆典、道德和宗教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旧的文化体系解体，近代文明曙光出现。

注
释

^①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3页。

与布克哈特不同，另一位杰出的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则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赫伊津哈于1924年出版《中世纪的衰落》一书，在英文版首版前言中，他敏锐但又耐人寻味地指出：“历史，就同自然界一样，诞生与衰落并存。一种过分成熟的文明的衰落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同样，在某些时期内，对新文明的追求也意味着该时期文明的衰落。”^①考虑到这部作品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难时期，特别是作者于1945年2月在荷兰解放前夕被德国占领军杀害，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赫伊津哈要以中世纪的衰落为主线来阐述文艺复兴、特别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历史。在赫伊津哈看来，即使是在文明发展的灿烂时期，黑色、暴烈的生活方式，仍然会在光亮之中忽隐忽现，不见得会完完全全地被光明盖住。中世纪封建传统的邪恶，那些疯狂和愚昧，仍会以其可笑的方式，在光明中与人共舞。与布克哈特乐观的结论不尽相同，赫伊津哈指出：“15世纪的法兰西和尼德兰本质上仍是中世纪的。生活的根基并未改变，经院思想，象征主义和强大的形式主义，关于世界和生活完全两重分裂等概念仍居支配地位。心性的两大支柱还是骑士制度和等级制度，阴郁的悲观主义给生活蒙上普遍的暗淡，哥特原则在艺术上盛行。”不过，赫伊津哈笔调一转，指出：“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和模式都在衰落，一个极强大的文化正处于瓦解之中。而同时，在同一领域，新事物正在萌生，潮流在转向，生活的音调将要改变。”^②

尽管文艺复兴的历史一直为世人所注重，研究文艺复兴的专著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人们对这场伟大运动的性质仍然没有很好理解。首先，人们常常误以为文艺复兴是社会繁荣昌盛的产物，认为它仅仅只是一场文化的运动。实际上文艺复兴是一场克服欧洲危机的社会振兴运动——用人文主义新文化、新道德来抵御黑暗，借此摆脱黑死病以来社会结构崩溃给人带来的灭顶之灾。文艺复兴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一些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在举世悲观的情况下，他们独辟蹊径，毅然发起弘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振兴欧洲运动。这些被后人称之为人文主义者的诗人、艺术家、政治家

注
释

①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英文版第一版前言，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56页。

和科学家们，又把从意大利起源的新观念传播到了欧洲各国，致使文艺复兴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从历史发展看，文艺复兴有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前者是人文主义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一场欧洲的振兴运动。自然，尽管文艺复兴的文化和文艺复兴的政治有着很多联系，两者仍然是各具不同的内容。

第二种常见的误解与唯美主义的文化观有关。这一说法把文艺复兴说成是一场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表现为对古典政治、古典文学和古典艺术的崇拜，以及对“黑暗的中世纪”文化的否定。这是一种因偏好艺术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情怀，尽管可以用来解释运动初期的宗旨，却忽略了人文主义政治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中的重要作用。事实是，贯穿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常见的口号“人的新生”——这是知识精英在危机时期对政治和社会道德秩序紊乱的一种反应，挑明一个主题：只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才能使欧洲摆脱苦难，获得新生。

在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中，有一些专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的专著，汉斯·巴伦的《从彼特拉克到布鲁尼》、《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就是其中难能可贵的学术名著。因为近代政治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多变，而文艺复兴时期（1350—1650）产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又往往是创造性的，这就要求人文主义者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要使混乱的社会具有秩序和意义，仅仅靠“人的新生”这样的呼唤是不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随时准备回答当时社会提出的诸多问题，并且还要在批判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创建出行之有效的近代政治模式。社会向时人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应当如何根据社会变化和人民意愿进行改革，以便建立起由人民参与政治的机制和按照民意来履行公共利益的新的政府。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是逐渐从伦理学中脱胎而出的，政治学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它和伦理学、修辞学、神学、哲学相互混淆，受到各种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的干涉。任何尝试撰写文艺复兴政治卷的人，从一开始起，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完全独立的政治学体系几乎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许多种互相平行发展的学问，或者是多

种互相联系着的学科在交叉发展,包括了道德学、美学、政治学、艺术学、逻辑学、教育学、史学、诗学、语言学、修辞学等诸多内容。这个问题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一定也是碰到了的。在1978年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中,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篇幅论述自由理想、修辞学和自由、经院哲学和自由,并把古典价值、美德、人文主义学术、圣经学、教育、城市共和国、君主政府皆视为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根本内容。斯金纳的这个做法,尽管是冒险的,但却是真实的,因为这正好概括了人文主义政治学历史性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学领域的这种革新,不仅要在反映世俗生活原则的历史学中进行,而且还要在当时尚未完全解体的君主政体和提倡灵性的基督教神学中进行。在但丁、彼特拉克看来,把政治学从君主制和神学中解放出来,似乎还是一件不稳定、难捉摸的事情。由此涉及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我们只要看一下伊拉斯谟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就知道这位文艺复兴后期最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在总结世界政治知识时,还是把基督徒君主应当如何忠诚上帝的观念视为法宝的。由此,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的一个要害问题就被提出: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即便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想本身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对抗?

意大利著名学者加林(Eugenio Garin)似乎也遇到过相同的难题,不过,他的做法显然是尊重历史的。加林善于把政治学置于伦理学的体系之中,视其为伦理学中的学科分支之一。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一书中,他认为:为了扬弃经院哲学和创立新文化,人文主义者们不得不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来确立其宗旨。他指出:“这些调查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伦理科学(道德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逻辑学、修辞学);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这样的调查成绩斐然,因为最终“它们摆脱一切羁绊和权威,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不同的层次上都取得蓬勃的发展,这是‘诚实’而‘愚钝’的经院哲学所未有过的”^①。加林视政治学为“伦理科学”中的一

注释

^① 参见[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种,这种看法,虽然有些保守,却不见得是没有道理。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看,政治学和伦理学一直都是互相交错发展的,或许要到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那里,两者之间才开始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分野。

尽管这样,文艺复兴政治发展明确的阶段性和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目标却给我们带来了某种便利。从思想上看,以世俗生活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学与以神学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学分离,导致了世俗政治思想的出现:“自马基雅维里以来,尽管纯粹世俗政权的国家逻辑在理论上一再受到基督教会抵抗,这种本质上与基督教观念对立的逻辑在政治实践上愈来愈占支配地位。”^①从政治目标看,那就是公民参与政治,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众力量推动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府和人民的公共关系的确立,取代了中古社会私人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百姓要求建立人民自由共和国的经验,无疑为近代欧洲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和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政治目标,在但丁、彼特拉克、萨鲁塔蒂、布鲁尼、马基雅维里、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等人的著作里得到反映。当时,没有哪类文献要比人文主义者的论述更敏锐地反映出社会道德的无序和政治局面的紊乱。著名人文主义者撰写的文章、书信,甚至是诗文、小说,只要一提到社会现实,都对漆黑一团的政治紊乱和道德败坏感到痛心。但丁的《神曲》是对被腐败社会扭曲了的人性的一种深刻揭露;薄伽丘的《十日谈》专门批判各式各样的社会道德腐败。彼特拉克著有《幸运与背运的医治》,对于人在无常命运摆布下的无能为力,给出自己的建议。所有这些都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如何让世人过上有道德的正常生活,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即建立自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公民国家。这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已经突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模式及中世纪公民参政的政治传统,发展成为以建立近代政府为目标的、民众的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出现过三种不同

注
释

① 刘小枫:“编者导言”,参见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基督教理论与现代》(*Christian Theory and Modernity*),刘小枫编,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版,第xxvi页。

的形式：从1300年到1375年为第一时期，特点是提倡美德和德治，提出建立德治社会的要求；从1375年到1450年为第二期，特点是提倡公共利益，要求建立自由的公民共和国；从1450年到1530年为第三时期，其时君主制已在欧洲取得支配位置，出现了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的著作。这里所说的道德论、自由公民论和君主论三种形式，虽然各有不同特点，但是，都是属于公民参政思想的范畴。这三种形式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期、发展期和转向期的特点。本卷拟就这三个时期的顺序，分别说明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以便了解当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对政治秩序的设计。

早期的文艺复兴有一个非常浪漫和诗性的起源，倾向于通过复兴古典文化来建立人间的社会道德秩序。其后，科学理性精神渗入运动，文艺复兴朝着建立新文化、新制度的方向发展，在政治上则明显要求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在浪漫时期和理性时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其时浪漫因素与现实因素共存、互动，形成理想情感与现实条件之间互相契合的极为生动的一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过后，意大利和欧洲进入了君主制时代，出现了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学，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人民共和国思想，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君主论以及以德国民众为代表的百姓共和国理想。这些派别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或从某一个方面，或从某一个领域，或以某种行动，证实了在君主制时代共和思想不仅存在而且发展。正是这种共和思想的日益发展，促成了从中世纪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

从1300年至1375年，是早期文艺复兴阶段。这一时期，但丁（1265—1321）、彼特拉克（1303—1374）、薄伽丘（1313—1375）等知识精英，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通过发展文化缔造新人的可能性。但丁出版了《神曲》，要求人们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问题。但丁认为：人活着就无法避免爱和罪的问题，反过来，就构成了罪与罚、人与神的道德关系。但丁告诉人们，生命存在绝非是一种自明的概念，对生命真理性的认识，有赖于对自己的能力和生命意义的认识。但丁特别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其中具有美德的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丁要人摆脱本能追求

美德，通过爱，去承担起建立人间天国的神圣使命，并能够在赎罪与恩典双重作用下完善人格。在但丁那里，人间与天国的距离被拉近了，同时教会和世俗之间的界限却被区分了，教会不应当干涉世俗政务，政权应当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但丁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这么写道：“我已用智力、用技巧把你带到了这里，现在你就以你的意愿为向导吧，你已经走出陡路，走出狭路……不要再期待我说话、示意了；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正直、健全，不照其所欲而行就是错误；因此我给你加王冠和法冠宣告你为你自己的主宰。”^①

1375年至1450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二时期，常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市民人文主义时期”。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中的市民们，受爱国情绪和人文主义启蒙的影响，关心城邦的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研究各种意大利的政体模式，尝试公民对话，企图在制度上按照人文主义思想，建立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首先使用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一概念，来概括这样一种爱国的、市民踊跃参与的人文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佛罗伦萨城邦的政治家、曾任秘书厅长官的萨鲁塔蒂（1330—1406）、布鲁尼（1369—1444）等人，后者曾担任美第奇家族的宫廷教师和教皇英诺森七世的秘书。布鲁尼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同时，他也致力于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历史学作品。布鲁尼的历史观其实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史。

1450年至1530年这80年，是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时期，这时无论是意大利还是欧洲都进入了君主制时代。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原来的君主为核心，建立起强大的君主政府和民族国家。实际上，通过君主制度，政府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封建时代主权分散、地方主义盛行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在意大利，随着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各个原来实行共和制度的城邦也开始向君主制度转变。尽管如此，意大利的新君主往往由大资产阶级家族

^① 但丁：《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的成员来充当，他们是一些贵族化了的资产阶级，因而不同于英国和法国。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同其他学科的界限不是很清晰，但是，就其本身的发展来看，它还是有比较清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线索的。在运动的早期，政治学表现为一种改造人性的学问，目标是锻造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的新人类。这不仅反映在伟大诗人但丁的作品中，而且也反映在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诗歌、小说和评论中。这种改造人性的政治学，不久就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涉及如何培养具有新人品质的君主、朝臣、臣民、知识分子、妻子和仆人。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即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在佛罗伦萨城邦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这种锻造更具有了社会的、制度的意义。在市民人文主义这一旗帜下，至少是在佛罗伦萨，培育新人的理想转变成为建立共和国制度的理念，要求人们按照人文主义的理念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过后，理想的、文化的、唯美的浪漫主义逐步为四种主要流派所取代，分别是以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经验学，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民众政治学和以德国百姓为代表的人民共和国。尽管上述四大类型的政治学模型之间有着明显差异，但是，它们都以某种方式继承和发扬早期人文主义者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现实主义的成分逐渐增强，在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那里，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学脱颖而出，最终把早期人文主义者改造人性的理念，转变成为如何在地球上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政府机构。

本书旨在努力解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政治广泛流行这一现象。各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这种政治变迁的不同方面。如果说知识精英对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社会变化有所反应的话，那么，它在政治学上是如何体现的？政治思想的特点是否显示了人们对政府功能和职责要求的转变？在非常复杂又变化多端的意大利及欧洲局势下，这种政治学满足了何种需要？在相对有序、控制更为严密的君主制时代又是如何的呢？这些思想表达了哪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们是如何解释社会的平等、如何定位人民意愿的？知识精英是否为行将到来的近代政治作过设想？比如说，即便是在君主制

时代,共和、民主的原则是在走向没落还是在继续发展?撰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和伊拉斯谟对君主制度的性质作过什么界定,同时托马斯·莫尔和德国起义者们在社会变迁面前是否显示出了对君主制的挑战?如果是,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是反映了一种顺应社会变化的意愿,还是提出了更为先进的人民共和国的想法,以便使真正代表民意的共和政权能够多多少少带来人们稳定、秩序和安全?此外,以民众参与政治为线索,本卷强调民众意愿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密不可分。每一章都涉及民众政治参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策等,努力提供一种观察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变化的新视野。

第一章讨论政治史学者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社会道德伦理与正式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社会道德伦理是人民愿意遵守的一些美德,在十三、四世纪期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把这些美德上升为一种政治品德,要求统治者按照这些伦理规范来行事。政府是否符合民意要看统治者尊奉这些美德的程度。人民期望那些按照美德行事并且给民众带来生计的明君来管理国家,并不在乎政体的形式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

第二章集中探讨当时人们对自由公民共和国这种政治制度的向往。人民用发扬爱国精神、做共和国好公民的方法支持政府,并认为所谓的美德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政治为什么会在佛罗伦萨得到充分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是出于自下而上公民参政的推动,还是因为米兰对佛罗伦萨的战争所引起?有趣的是,在自由公民共和国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佛罗伦萨,共和体制最后却解体了。与从封建国家里脱胎出来的君主一样,城市显贵不再显示与民众结盟的一面,他们成为新的君主,实现了对城邦的完全控制。简言之,在佛罗伦萨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共和政治,最后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这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解释。

第三章阐述君主制时代政治的变化,着重分析欧洲君主制度的特点、新君主统治下的英国,以及英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宗教宽容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新君主政府的两重性:既有建立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的一面,又有背离人民意愿、向专制君主制度转换的一面。这只有从君主制国

家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君主制的信仰出发，才能够找到一种解释。这一章还论述了一个观点：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往往是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根源。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存在差异：在王权比较强盛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新型的君主制度似乎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但在王权力量薄弱而公民参政又具有传统的意大利，政府体制则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面貌，共和制度不仅具有强大基础，而且还出现了具有近代特征的自由公民共和制度。

第四章集中探讨这一时期最为引人关注的变化：共和主义在君主制时代的命运。通过对马基雅维里、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政治思想和对德国百姓共和国的分析，可以看出共和主义理想在君主制时代不仅没有变成“残余”，反而还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马基雅维里从共和政治里摒弃了世袭君主的存在，托马斯·莫尔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德国的百姓则要求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权。正因为有这些几乎全新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了近代政治的思想基础。

总而言之，本卷旨在分析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和他们的政治要求，以便说明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乃是近代政治学兴起的真正基础。近代政治的发展，是伴随着公民、市民和农民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不断拓展而发生的。让我们接下去看一看这些变化。

欧洲文艺复兴史

宋健

目 录

总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文艺复兴创立时期的道德政治论	/1
第一节 意大利的市民社会	/3
一 14—15 世纪的历史背景	/3
二 市民对社会变革的反应	/8
三 与中古文化传统相分离	/12
四 拯救危机的基本原则	/16
第二节 但丁的道德体系和世界帝国	/18
一 道德政治论的提出	/19
二 奖惩体系与但丁的仁政观	/23
三 但丁的世界帝国	/30
第三节 彼特拉克的民生政治学	/32
一 彼特拉克思想上的一些特点	/32
二 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	/35
三 民生问题和城邦安全问题	/38

第二章 文艺复兴发展时期的自由公民共和国 /47

第一节 自由城邦的概念 /47

一 自由城邦的概念 /48

二 萨鲁塔蒂和布鲁尼 /51

三 《佛罗伦萨颂》所传递的道德命令 /54

四 自由城邦论的主要特点 /57

第二节 公民的美德与共和国语境 /61

一 为保卫共和国而积累美德 /62

二 为意大利统一而说民族语言 /65

三 共和国的妇女 /70

四 诗和文化的启蒙 /75

第三节 人的能力、平等和自由 /82

一 政治能力抗衡命运 /83

二 人性与平等 /86

三 个性与自由 /88

第四节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瓦解 /91

一 早期民众政府的基本结构 /92

二 控制选举：城市显贵对共和体制的新阐释 /95

三 美第奇家族的强化措施 /96

四 权力的分享：如何理解不稳定的寡头政治？ /100

第三章 君主制时代的政治制度 /105

第一节 欧洲的君主制度 /105

一	15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	/106
二	新君主制的兴起	/109
三	新君主的力量所在	/126
四	新君主与封建君主的比较	/140
第二节	新君主治理下的英国	/141
一	国家的安全和外交	/141
二	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152
三	社会结构的变化	/155
四	乡村中的变化	/158
五	文化成为增强国力的手段	/163
第三节	近代化的步骤：英国的宗教宽容政策	/168
一	英国的宗教问题	/169
二	宗教宽容政策	/174
三	苏格兰新教徒	/181
第四章	文艺复兴转向时期的政治学	/187
第一节	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的思考	/188
一	佛罗伦萨政治的发展	/189
二	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研究	/191
三	历史的经验和智性的善	/197
四	共和制度与君主制度水火不容	/200
第二节	伊拉斯谟对于政治的思考	/203
一	美德和人的命运	/205
二	人的自由意志	/209